

女性主義者福利取向及對福利國家反省

林宜輝

一、前言

二次大戰後有關福利國家緣起或擴張之解釋可謂百家爭鳴，諸如工業主義邏輯、功能論觀點、公民權觀點、馬克思主義觀點等，即令一九七四年石油危機後，短暫的福利國家自滿遭遇重挫，有關福利危機論戰中仍一如前述充斥著性別盲點，如福利國家「財政危機」便忽視婦女將比男性承擔更多福利預算削減所帶來負面效益；而福利國家「合法性危機」則輕忽福利國家在婦女強烈需求、支持下，仍能維繫其對抗市場信念；至於福利國家「政府失靈」所採私有化福利提供模式將嚴重衝擊婦女做為雇員或案主角色，為回應上述福利論戰缺乏女性觀點，晚近西方

國家女性主義者已提出其對福利制度的見解與關懷，以女性主義觀點審視福利國家是否儼然專為男性之制度設計，並對其可能「解放」或「箝制」本質展開精闢辯證，其實由西方福利國家歷史發展近程，婦女問題已成為思考社會福利核心之一，也是女性主義者所要辯證、抗爭重要戰場，臺灣近來雖經採借漸成時興議題，但總欠缺系統化有關女性主義觀點之社福理論論述，故本文決定以女性主義福利觀點詮釋不同女性主義者福利取向，及其評估福利方案成效後對福利國家舉措之反省與批判。

二、女性主義福利取向

「女性主義」(feminism)一詞源於十

九世紀法國，原意為婦女運動，經兩世紀演進已衍生諸多不同詮釋觀點(perspectives)，但綜觀相異流派，其主要內容仍以反對女性因性別因素受到個人、社會、經濟歧視之論述為主，女性主義深信性別壓迫是人為及社會制度建構使然，雖歷時已久仍可透過人為力量加以改變，所以做為一規範性(normative)理論之女性主義其理論主旨可歸納如下：(1)描述男女存在不平等現象，或女性的第二性處境、(2)由女性觀點解釋壓迫成因、(3)進而提出促成兩性平等或婦女解放的策略及行動、(4)最後從社會結構根除宰制與附庸關係，建立性別平等的烏托邦(顧燕翎，一九九六)。承上女性主義社會科學宗旨便欲以女性措辭(terms)描述女性真實生活經驗，

進而建構扎根(grounded)婦女經驗、語言之理論(Miller, 1989)。^{六〇}年代末西方婦女運動就促成理論深化，並反思福利國家作為，時至今日已累積可觀研究，如Wilson(1977, 1980a)、Bryan(1985)、Ungerson(1985)、Dale & Foster(1986)、Pascall(1986)等研究皆以分析福利國家中社會安全制、健康、住宅、教育、或其它福利服務內涵為主，而她們最主要貢獻在於揭示再生產(production)／社會再生產(social production)領域的實在，尤其影響婦女生存深遠社會再生產及由此衍生關係就是論證福利政策是否考量女性需求關鍵所在，總之女性主義已嘗試剖析相關核心問題，如婦女為何非在社會再生產中扮演如此舉足輕重角色？社會再生產或國家介入究竟對婦女產生何種寓意？可否改變女性再生產角色？如有此可能，又該從何著手？部分女性主義也不再簡單承認婦女於家戶中從事無償勞動、勞動市場中提供廉價勞動之命定事實，畢竟對她們而言，這都只暫時正中資本主義調節勞動需求下懷，相反對女性有意義是該積極投

身抗爭、翻轉福利國家正當性之改革運動，如此才可徹底擺脫社會再生產對婦女箝制。儘管「女性主義」演進至今已出現不同觀點(perspectives)，但仍無法被整合為單一之社會政策理論體系(Dale and Foster, 1989; Williams, 1989; Pierson, 1991; Pascall, 1997)，如Dale & Foster(1986)在討論女性主義觀點之社會政策時，便界定有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急進女性主義與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三大福利取向：Df Walby(1990)也提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急進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與雙元系統理論四個女性主義福利取向，除上所提外，其實由西方福利國家發展歷史仍可發現另存二種相異陳述觀點，其一為源於第三世界移民女性主義者對以白人女性為詮釋中心女性主義所做批判之「黑人女性主義」；其二為深具歷史意義的女性福利思潮，即「福利女性主義」；其三為與右翼(right-wing)勢力相關，晚近才崛起之「保守主義女性主義」，也因此揀選Williams(1989)所提保守主義女性主義(conservatism feminism)、自由主義女性

主義(liberal feminism)、福利女性主義(welfare feminism)、急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社會主義女性主義(socialist feminism)與黑人女性主義(black feminism)，為欲澄清、評估六大不同女性主義福利取向，藉此了解不同女性主義者福利理念及其對現有政經原則範定下之福利國家採取何種行動邏輯。

(一)女性主義福利取向內涵分析之二：

保守主義女性主義(C. feminism)
保守主義女性主義實發軔於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可視為其分支，它主要是由一群新右派(New Right)陣營女性從政者及忠實者所組成，也因此是繼承新右派理論，在政治哲學上，主張政府應當保障人民的基本人權與自由，但人民須自謀福祉；在經濟思維上，則採行保守資本主義觀點，認為資本主義或自由市場經濟制，不論就生產、分配方面而言，都是一種最好制度，其所持理由有：(1)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私有財產制能使個人基於自願或自利動機來行動，而對他人產生最大可能的貢獻；(2)在所有可

能的制度中，只有資本主義制度能創造極大的壓力，迫使財產和資訊的成本不得不降低，浪費不得不減少，效率不得不提昇；(3)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並非為某些人而設計的，未必對某些人特別有利，它是自發，它不需要人們加以刻意規劃或改造；(4)自由市場自發力量所形成制度便能滿足人的需求，並不斷增進人類福祉（李明政，一九九四），保守主義女性主義者最明顯口號莫過於「爲了生命、自由與財產」（For Life, Liberty and Property），由口號所訴求重點可知其不在宣示所謂平等或社會正義的法律，相反是主張透過市場追求個人最大自由，因此保守主義女性主義者堅決反對國家干預，要求干預最少的政府組織型態（a small government），畢竟對她們而言，國家介入只會阻礙婦女獲致更進一步自由，如一些保障勞工雇用的法令便常使雇主更不願雇用女性員工，另兒童津貼也有強化女性操持家務角色可能，綜合上述，還是只有透過市場經濟機體運作才能確保個人與社會福祉的「最適性」（optimum）以及個體的自由（liberty）（H

順民，一九九五），只有當市場完全競爭、市場愈自由化、雇主用人唯才時才可能徹底消除對女性的制度化歧視，其實目前愈來愈多職業婦女就因此受益其中。不過已有批評者認為保守主義女性主義者其實忽略了絕大多數婦女母職待身事實，這使根本無法依照個人意志自由進出市場，除非她們的所得足以支付其購買家庭幫傭，或國家提供充分的兒童照顧服務條件下，婦女才有可能充分的就業，但顯而易見想使不同女性具備上述相似條件是不切實際，保守主義女性主義可能不過在虛構一個階級旨的個人主義（class-blind individualism），錯誤地認為婦女真可選擇她們所要場域（A women's place is where she choose to be）（Campbell, 1986; Pascal, 1997）。

儘管保守主義女性主義信守新自由主義之個人主義，但卻拒絕新自由主義者如Friedman、Hayek、Mountr等生物決定論（biological determinism），因為這些新自由主義者宗師總認為婦女育兒的本能決定母職角色。另其文宣上所提尊重生命口號表示保

守主義女性主義堅決反對墮胎立場，一些成就動機較高的姊妹們便不接受此一理念，因此保守主義女性主義就分裂為兩派系，一為拒絕婦女生理具顯著意義，另一則視婦女生理對其生命存在重大意涵，最後兩派系所共享信念只剩個人主義而已，即便至今兩派仍對生物決定論未達共識（Williams, 1989）。

保守主義女性主義者甚少討論有關福利制度化的問題，因為對她們而言，國家任何型式介入皆無助改善婦女生活，也許美其言是保護她們，最後還是限制她們成為獨立自主個體，甚而藉由介入而規範母職工作的執行，因此她們認為所謂慷慨之名的福利國家是不必要，除非基於人道或政治安定性考量，國家才可對特殊需要照顧者或弱勢群體提供制度性福利，但仍須強調此種福利是採選擇性原則，且提供最低成本福利，歸結保守主義女性主義想法，市場與家庭才是最重要福利提供者。美國保守派也認為現行寬大國家福利政策結果只是造成離婚率增高、墮胎比例上昇、單親家庭增多等問題，故應確實檢討福利政策是否具維繫傳統家庭模式功

能(Murray, 1984·李淑容,一九九四),另英國八〇—九〇年間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同樣高倡回歸傳統家庭的道德價值,期間英國經濟部門為配合此一政治氣候發行有「沒有父親家庭」(Families Without Fatherhood)、「家庭:另一個生活方式選擇」(The Family: Is it Just Another Lifestyle Choice?)等說帖,同時英國保守黨女性參政者也強調家庭應具自理切身福利的獨立性(independence),否則家庭破敗所造成便是現在那些層出不窮的青少年犯罪或街頭遊童問題,不過仍有反對者質疑保守主義女性主義所做的論述,她們認為「獨立」只是個相對概念,別因此刻意模糊既存公私領域不合理分工之事實,另個人即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理念亦彰顯家戶內部福利事務還是可成為公領域中具討論價值的政治議題(King and Ward, 1992; Pascall, 1997)。

(二)女性主義福利取向內涵分析(2)：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Liberal feminism)
自由主義繼承了十七世紀啟蒙時代洛克

主張「天賦人權」、盧梭「自由主義」中提倡個人自由理念,便極強調社會地位取得應憑個人能力,而非沿襲傳統地位,至於個人能力高低可藉市場競爭獲得公平酬賞。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對抗封建制度使自由主義思想取得進一步發展,而在法國革命後,自由主義革命思潮也對女性主義產生影響,如Wollstoncraft(1759-1797)在「為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 of Women, 1792)中便以啟蒙時代重視理性、自由及平等權利的哲學理論為基礎,強調女性是一個個人(human beings)而非性物(sexual beings),她應與男性同樣享有平等權利,拒絕男女間存在任何差異,強調是社會偏見、尤其是那些似是而非的生物決定論才是促成性別歧視,性別不平等主因,也因此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相信可發動一些行動來改善上述不利女性狀況,如Dale & Foster(1986)便曾指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有四大行動綱領,即(1)消除對女性的歧視、(2)藉由增加女性在政治方面的代表,提昇女性權力地位、(3)鼓勵並促進更多女性獲取更高薪資、更好工作、

(4)減少學校教育所造成性別歧視或性別刻板化印象(sex stereotyping),並提供女孩平等的機會,其實我們可歸納上述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兩大行動策略:第一行動策略為社會須制定出公平競爭規則,改革現有具性別盲點法律,改變以男性中心主義(sexism)為思考的福利提供與管理模式,此具體表現如關心女性教育權、選舉權、解除歧視女性的法令,及撤除妨礙女性進入公領域障礙,如美國六〇年代全國女性協會(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en,簡稱NOW)成立、平權運動(Equal Rights Amendment,簡稱ERA)發起:而在英國,七〇年代反性別歧視立法、平等機會委員會(EOC)成立、一九八四年社會保險法修法皆可說是該派對消除性別歧視所做的努力,當檢視這一個行動方法時,可發現不脫理性思辯、教育大眾正確性別相處之道,這也使得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充滿了高度意念主義色彩。至於第二個行動策略則是增加女性在權利機會上的優勢,其具體表現有爭取避孕權、墮胎權、生育離職(maternity leave)福利、國家設立日

間照顧機構等活動，當檢視第二個方法時可發現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將國家界定為改革機制，可藉其消除女性生理對婦女之生活機會不利影響。上述所採如高倡女性應積極加入工商業、教育、政府系統、議會政治等社會主流機構之行動策略其實與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主要訴求對象有關，唯有如此才可使中、上階層女性獲得競爭性且高報酬工作、才可刺激她們發揮潛能，獲得成就感滿足，尤其晚近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更將全部心力投注在推動制定反歧視法相關運動上（林芳政，一九九六）。

目前對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質疑多環繞在兩大面相，其一為上述提及行動策略，其二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對國家的看法態度，在對其行動策略質疑上指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往往依「反生物決定論」假設（即生理差異不會阻礙兩性追求平權），演繹出僅透過公領域的婦女運動便可畢竟全功行動邏輯，但此行動邏輯卻可能違反所宣示的「反生物決定論」假設，我們可以下列說明之，如在爭取福利平等權活動上，主要目標是想讓更

多女性在福利機構中擔當更具權力角色，如女校長、醫師、諮商人員或福利服務管理者等，一間學校的女校長便可示範兒童受期待的角色模式，福利機構女性主管也可化僵化為彈性之福利輸送，但殊不知上述所謂「女性當家」好處實則意味著男性與女性展現出不同的管理風格——即男性與女性本質上是存在差異的（men and women are different），而非「反生物決定論」所述兩性不存在差異原初假設，急進、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更質疑該派在學校中運用社會學習論所推行反男性中心主義（sexism）教學活動不見成效，尤其當角色反轉威脅到家中男性其權威時，受期待角色反轉可否生效乃至社會真能提供有益角色反轉環境在在令人懷疑（Miller, 1989; Williams, 1989）。至於在對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所持國家（state）看法進一步批判上，急進女性主義認為國家是被男性所操縱且以男性利益為考量；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則認為國家服侍於資本主義、父權主義時，國家並不會維護女性利益，女性權益勢必更沒保障，所以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所提如下假設，

即國家在施壓改革過程中可坦然接受任何訴求，扮演一個中立調停者角色（neutral arbiter）是不見得成立（Dale and Foster, 1986）。

（三）女性主義福利取向內涵分析之二：

福利女性主義（Welfare Feminism）

追溯福利女性主義的思想源頭，可由Vogel所描述十八世紀對婦女問題兩主要看法談起，一是Wollstonecraft論述，前已提及，此便不再贅述，另一為德國作家Friedrich Schlegel所強調女性可憑其陰柔之優勢特質尋求解放（Vogel, 1986），而第二種觀點便成為福利女性主義隱含的理念基礎，且在同歷史時期似都得到策略性運用，如一次大戰後所發起國家照顧母親、兒童的運動便是極佳例證，此時女性主義者不再訴求形而上的改革目標，而著眼於妻子、母親實質需求的滿足，所以該派主張改革是為滿足私領域母親與妻子的需求，而非促成更多女性投入公領域為考量。Margery Spring Rice(1939)便在其「婦女勞動階級」(Working class Wives)一書述及二十世紀初英國婦女所關心

議題多為兒童與婦女健康不良、家庭薪資(family wage)不足與男性薪資賺取者其經濟支持不可靠等問題，這也促成廣設嬰兒健康中心、一九一八年完成生育與兒童福利法案、家庭津貼發放等一系列相關福利運動。

Mollie Banks研究亦指出此派全盛期約在一次大戰至一九四五年間，期間共發起如女性避孕權、保護女性家務角色等活動，不可諱言，其實這些活動是因其他利益團體支持才成功，而他們各有各的考量，如帝國主義者視此有益英國種族綿延、勞動階級視其為薪資延伸、抱持家庭主義的「國家」則視此可提昇女性照顧家庭責任感，也因爲上述利益糾葛因素，福利女性主義常被譏爲打著保障女性旗幟，背後實隱含默許女性將永遠淪爲社會不公受害者、家中經濟依賴者等不利女性事實，其實福利女性主義將私領域家庭一切視爲恆常實在，兩性在本質上是存在差異的，且女性的生理早已決定了她的現實命運。Rathbone(家庭津貼倡導者)曾言：「婦女是兒童最自然的監護人，這可能是男性賦予我們的傳統角色，但也是我們不能拒絕

的天職」(Lewis, 1984)，近代有關女性福利的討論常引上言合理化女性有關喘息減壓的福利需求，英國前國家兒童局董事Kellmer-Frang也堅持女性母職及做爲照顧者的價值，他總一再強調因天性及性別分工使得女性才足擔育兒重任，由上知福利女性主義是充滿女性宿命論(Women's lives determined)的色彩，儘管正面褒揚女性生理價值，但不可避免將深化了公私領域劃分；另福利女性主義也未清楚解決有關女性勞動階級其公私領域歸屬問題，即國家的福利給付究竟要驅使女性勞動階級擔負何種角色？總之福利女性主義未徹底挑戰既存國家與家庭責任分工或父權主義福利組織所存在的問題，不過若與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相較，雖同屬意念主義，福利女性主義卻未迴避有關生物決定論的問題，相反的是竭力尋求與婦女性命運有關母職或婚姻的可能改善途徑(Williams, 1989)。

(四)女性主義福利取向內涵分析之四：

急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

急進女性主義者認爲自由主義女性主義

與馬克思女性主義總未正本清源、一針見血地分析女性受壓迫事實，所以該派主張將社會解讀爲一男性群體(或階級)正壓迫著一女性群體(或階級)圖像，當男性制度化其對女性支配統治便形成所謂「父權體制」。不過Rowbotham(1981)曾指出，如此過度地強調父權體制意味著，長久以來就存在一種普遍且具歷史意義的生物性壓迫，也就是說，性別壓迫是一切壓迫的根源，其他壓迫只是前者衍生物，女性異質(female difference)才是女性受壓迫的根源(王瑞香，一九九〇)，所以急進女性主義是明顯不同早期女性主義者主張的性別角色(gender roles)社會建構論，也因此這種對父權體制生物性(biological)解釋模糊了許多先輩反生物決定論的焦點。不過就急進女性主義者而言，生物決定論並非洪水猛獸，女性除照顧、分享的特質外，還有許多未被開發的生理或心理特質將逐漸成爲婦女解放的能源。承上知急進女性主義以生物決定論觀點思考父權體制問題，而父權體制又立基在男性攻擊本性上，急進女性主義因此演繹出兩大解放策略，

一為政治分離 (political separation)，即在運動、組織、工作上與男性盡可能隔離；另一為個體分離 (personal separation)，即只與女性生活且建立關係，上述做法除因政治上考量外，主要是她們認為與男性維持關係是耗時傷神，與其如此，不如同女性建構一理想女性生活圈。七〇年代後，急進女性主義取得分離主義之行動路線共識，其中色彩最鮮明便是女同性戀者 (王瑞香，一九九六)，這一派便不尋求與男性平等，且拒絕男性，朝向「母性系統」 (matriarchy) 發展 (Dale & Foster, 1986)。同樣在對政府介入的討論中，急進女性主義仍強調女性本身自我獨立、婦女授權，傾向反對政府干預或政策介入，畢竟政府介入不過又是父權控制另一型式，其實女性會有屬於自己的應變之道，如所主張女性自我組織、女性主義文化、女性自覺團體、母性天職的破除等以女性自身出發的具體政策皆可回應分離主義主張，一般而言，急進女性主義較關心女性生理上遭受性別壓迫問題 (如強暴、家庭暴力、色情文學及女性健康等)，這使其大

力主張應提供女性庇護所、緊急處遇中心、墮胎診所等專為女性之特別福利服務 (張齡友，一九九二)。總之，由急進女性主義所採分離主義策略可發現仍屬意念主義，因為它把改革完全簡化為透過脫離男性，發揚女性中心 (woman-centered) 價值即可水到渠成，結果急進女性主義常被譏為退卻主義 (retreatism)，失敗主義 (defeatism)，儘管急進女性主義常批評馬克思女性主義太過經濟化約論，但它亦不過五十步笑百步，漸漸掉入另一生物化約論窠臼。

(五) 女性主義福利取向內涵分析 (NI)：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 (Socialist Feminism) 馬克思女性主義同意馬克思、恩格斯所述，即資本主義導致了父權主義與壓迫女性史，尤其私有財產制促成父權制發展 (因為女性淪為男性第一項私有財)，所以只有 (要) 翻轉資本主義，才可解除此等壓迫，但後來發現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女性仍須順服自然性別分工處理家務，如此也促成六〇年代「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出現，畢竟以往只以經濟結構、社會階級來解釋女性受到壓迫事

實，卻忽略了「性別」關係的力量，因此早期的觀點是存在性別盲點 (gender-blind)，忽略女性特殊地位，也沒有對家庭深入分析，所以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不僅要採用 Marx、Engle 的觀點，同時也要以性別系統的觀點來分析女性所受到的壓迫，畢竟女性在家與職場的從屬地位是導因父權資本主義 (patriarchal capitalism)，而非僅止資本主義 (李元貞，一九九〇)。

在此為更清楚了解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福利取向，所以將先對其前身馬克思女性主義內涵做個簡單回顧。有關馬克思主義福利觀點可歸納如下：1. 福利是對工作與生活情況的調整 (regulation)，也是立基人類需求的社會資源分配；2. 資本主義社會系統與福利是不相容 (antithetical to welfare)；3.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推動福利初期仍見成效，但受限社會本質，發展前景有限；4. 在階級劃分的社會，政府與國家機器多為支配階級服務，但做為共同體代表，國家仍得在某種程度依公益行事，結果在資產階級國家呈現出一種偽善 (Janus-faced) 式福利，福利只

是形式上被同意，但實質卻未落實：5.真正實質的福利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方可落實；6.社會福利短期可使資本主義經濟運作更有效率，更平穩；7.社會福利蘊涵著社會控制的功能，即鎮壓階級衝突，維持社會穩定；8.無疑的，社會福利是由一部分統治階層所發起的；9.社會政策或福利儲備不過為回應資本主義所造成衝突，生活環境不良等問題，在此我們要特別要注意資本主義下「系統結構性需要」、「資本主義（或資產階級）合法性（legitimation）需要」、「勞工階層需要」與「階層內衝突」這四股衝突競爭壓力對形塑福利國家所可能產生的影響；10.國家試圖藉由干預解決資本主義自身的社會矛盾，但卻帶來新的矛盾，福利國家對資本主義隱藏著穩定性與不穩定性因子；11.社會政策已反映其分化式的剝削或壓迫，如對女性無償勞動榨取；12.上述衝突競爭的壓力促成福利制度再發展，但發展過程中卻帶來更深的衝突，因為福利制度發展限制了資本擴張的可能，所以福利制度雖對資本主義不可或缺，但也成為資本主義另一亟待解決問題。（

Mishra, 1979; Lavelette, 1997）。

馬克思女性主義者承襲上述馬克思主義的看法，認為福利是政府與資本家共同設下陷阱，福利制度及立法只是國家為了資本累積、主導經濟與穩定政權與的手段工具（O'Connor, 1987）。所謂婦女福利也只是讓婦女更依賴國家，失去可能獨立自主機會，這也使馬克思女性主義同保守主義女性主義反對國家介入，但所持理由卻大相逕庭，馬克思女性主義者Wells與Wilson（1984）就批評費邊社會主義一再寄望工黨，所能達到也只是家戶中男女間金錢、有酬無酬勞動之重分配，而非社會體系中財富重分配終極理想，對馬克思女性主義而言，費邊社會主義不過淪為「生活方式女性主義」（lifestyle feminism）、「立憲派女性主義」（constitutional feminism），若以目的論之，馬克思女性主義認為福利對婦女是虛偽的，一如產業預備軍與雙元勞動市場所述，福利國家的「國家」基本上還是掌握在男性資本階級手中，往往所制定福利政策目的上只想更加鞏固資本主義父權體制對婦女壓迫，對婦女造成更大

傷害，甚而福利國家為增進資本主義利益還刻意維護某種壓迫婦女的家庭型態其存在價值，因此福利國家已淪為規範家庭生活組織（Woodward, 1977）；若以結果論之，一味期待福利國家的福利措施只會使婦女更加依賴，綜觀上述，馬克思女性主義者便主張放棄對資本主義患得患失期待，放棄在資本主義下爭取婦女福利的錯誤策略，應顛覆現有並代之以新的社會經濟生產結構才有可能創造婦女文化，徹底解放資本主義父權體制對婦女箝制（張齡友，一九九二）。

不同於馬克思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則更強調父權體制聯合資本主義後對女性壓迫的詮釋，它既不採階級支配一元論，也不採性支配一元論，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乃是並存的兩個社會領域，而其間具有「辯證關係」（dialectic relation），儘管兩者雖是相互對立，卻也偶有相互調和補足作用，因此是符合矛盾且調和的辯證法則（劉靜貞、洪金珠譯，一九九七），如Hartsock（1983）在「金錢，性別與權力：女性歷史唯物論流派」（Money, Sex

and Power: Toward a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一書在分析女性福利意旨時便強調運用兩者的辯證關係，她指出男流共同體所發展出社會福利體系基本是與性別功能相關。另Miller則進一步發展出「父權體制必要性」(patriarchal necessity)概念，所謂「父權體制」其實是一個由法律、文化、社會規範所支持的性別階層體系，藉以維持男性無上統治，而「父權體制必要性」則是一群(collectivity)男人為維繫統治支配，而不得不從事性別(sexes)劃分或貶抑女性的一切作為，也因為此父權體制必要性才造就了現時社會福利性別階層化情形，但在此須強調不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對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纂謀型式仍存在許多不同詮釋(Yuval-Davis, 1989)。近來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貢獻最力在於戳破有關「家庭薪資系統」(family wage system)神話，所謂家庭薪資系統係假設男性可以薪資一部分作為「家庭薪資」滿足妻子及家庭的需要，使婦女安心無虞從事照顧家庭工作，而社會安全建制就直接以該假設為設計基礎，即便社會工作、

教育、住宅、健康保健等政策也間接受此理念影響，甚至工會還因此對女性設定較低工資，並分配婦女去從事低薪、無前景工作，透過此一連串機制運作後，「家庭薪資系統」反成一自我實現預言，再度強化了男人隻手養家、家戶中從事公平和諧家庭薪資分配、女性永遠做為經濟依賴者等社會迷思(Barrett and McIntosh, 1982; Williams, 1989; Woodward, 1997)。對此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便採上述「父權體制必要性」概念直接挑戰社會安全系統所立家庭薪資系統假設，反對現存制度其差別待遇，尤其是對已婚及同居婦女的不友善規定。其實此等主張也與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反對傳統性別分工有關，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便認為不該將「家庭的責任完全加諸婦女身上，如二次大戰後對女性所提供「福利」其實不過是強化女性的「家庭責任」罷了，因為它主要是針對女性的「家庭」，而非女性的需求提供福利，儘管女性就業增加了，但她們多還是從事部分工時工作(part-time job)，因此這種略施小惠的有償工作仍不脫榨取母職無償勞動

的考量，在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想法，理想中的女性福利應是政府提供兩性平等的勞動政策，如公平的就業機會，而非以強化婦女「家庭責任」為考量作附帶條件的福利(Lewis, 1986)。而環顧福利國家已可見許多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投身地區性或全國性女性權益組織，積極為女性爭取較佳衛生保健、住宅、社會安全、兒童或老人照顧、教育乃至雇用上福利，如英國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便積極參與婦女權益組織(Row)、國家兒童照顧團體、地方性婦女勞工團體、再生產權益促進會，亦漸對地方政府、工會、工黨社會政策發揮其一定影響力，對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而言，她們主要目標並不只爭取更多福利提供(more provision)，相反的是強調一種非男性中心主義、非種族主義、非增強殘障者、老人福利依賴、反(女)同性戀歧視、打破(break-down)專家管理的福利提供模式。

(六)女性主義福利取向內涵分析之六：

黑人女性主義(Black Feminism)
晚近英美兩國反種族主義(anti-racist)、反白人女性主義思潮形構了黑人女性主義出

現，在此派的論點中強調黑人女性所經歷的壓迫是來自種族、性別、階級等因素，也就是說黑人女性不僅受到白人女性的壓迫，也同時受到黑人男性的壓迫，除上述外，以白人為主導的社會中亦存有鼓勵白人女性對少數民族之男女進行壓迫事實，有此一層體會後，美國黑人女性主義者Joseph(1981)便批評Hartmann在「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不快樂的婚姻：尋求更進步的聯合」(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一文雖提及父權體制、資本主義對女性造成壓迫，卻忽略兩者近親相姦產物——種族主義(racism)仍危害頗劇。目前坊間已出現許多黑人女性主義論述，它們多以種族(race)/性別(gender)為參考架構，檢視黑人女性在工作、家庭、男性、情慾、再生產、國家中的地位所面臨到的問題，並探討為何她們有這麼不同於白人女性的經驗，黑人女性主義其實發現種族與性別並非單獨對女性施壓，而是以一種魅惑型式迫害黑人女性，以女性再生產議題為例，國家常為包裝家庭

主義(feminism)的意識型態而盛揚母職正向(positive)價值，如母親是具正面評價，但對黑人女性則有極端不同詮釋，因為黑人母親並非黑(負面)與母親(正面)的價值綜合評判，而是所謂雙重負面評價——她又再生產「更多黑人」(the reproduction of more blacks)(Williams, 1996)。

對有種族壓迫經驗或生存於種族壓迫地區的女性而言，她們所面臨的問題往往無法以「父權壓迫」一言以蔽之，而是必須放在特定種族歧視的政經脈絡裡來思考，如此才能尋求解決之道，所以就父權制度的討論而言，黑人女性主義認為急進女性主義對「父權制度」概念太過模糊，因為當它強調婦女同為被壓迫者時，便化約所有女性為一同質性的群體處理，高舉女性主義「姊妹情誼」(sisterhood)，結果黑白女性之間的差異就被略而不談，「姊妹情誼」往往塑造一派以中產階級白人女性為中心女性主義理論，忽略了黑人女性異於白人女性的抗爭訴求，黑人女性主義也不同意急進女性主義認為男性皆為壓迫者論述，因為實際上白人男性極

不願與黑人男性分享資本主義權益，回顧英國黑人女性歷史，黑人男性不必然是黑人女性的敵人，相反是攜手對抗內部殖民主義、種族歧視等運動的同志。另黑人女性主義認為所謂福利「國家」亦不過採取如Carby與Wilson所述兩手策略，一方面依類黑人女性廉價勞力投入政府福利部門，其目的是想壓低福利營運成本，另一方面卻又利用責難黑人女性未盡母職，盡量限制黑人女性其福利受益資格，盡可能排除黑人成為福利最大受益者可能，因為它知道許多黑人女性是有依賴兒童，她與其小孩有很大可能成為國家所不樂見的福利依賴者結果，如英國自五〇年代以來，其國民保健服務(NHS)便充斥大量黑人女性員工(多以海外移民為主)，即便日後移民法規定更形嚴格，此等福利部門高比例黑人女性員工情形仍舊存在，但要注意的是這些黑人女性員工普遍未享有同白人女性水準的福利(Williams, 1989)。

三、不同流派女性主義福利取向之診斷

不同時空背景下，女性主義理論接受不

同主流思潮衝擊，進而衍生出各種不同流派。

Williams(1989)為因應社會福利政策討論，便發展出診斷女性主義福利取向之架構，首先分析不同流派女性主義理論內涵中四個面向：其一為探討不同流派女性主義所認定女性受迫原因；其二是了解不同流派女性主義對女性生物決定論評價；其三為評估不同流派女性主義側重「公領域」或「私領域」程度；其四是了解不同流派女性主義所強調女性受迫經驗為普遍性(*generality of women's oppression*)或具差異性。進一步再由上述四大面向演繹不同流派女性主義對下列三大福利議題所提出各自社會政策規範或主張，其一為有關國家、家庭與婦女間分工問題；其二為在福利方案受益資格上，婦女應以母親、工作者或個人權利為基礎；其三為福利組織應具何等內涵，(如是否容許有關性別，種族或階級等差別待遇存在)，最後由上述歸納不同流派在方法論上趨近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意念主義(*idealism*)或物質主義(*materialism*)程度。有關不同流

派女性主義福利取向之診斷結果可見表一。

四、女性主義者對福利

國家反省

目前已有許多調查結果支持女性主義對福利國家未盡保障女性福利之責的負面評價，在對福利國家觀察中，可發現福利國家為女性所需且被支持，這原因主要是女性較男人貧窮、平均餘命較長且較少機會取得市場所提供財貨與勞務，若由福利需求面觀之，在美國有八一%領取失依兒童家庭補助(AFDC)家戶為女性戶長家戶，另有超過六〇%領取食物卷(*food stamps*)或醫療救助(*Medicaid*)，七〇%領取房屋補助家戶亦為女性戶長之家戶(Fraser, 1989)；若由福利供給面觀之，因大部分工作女性多在福利部門服務，國家已儼然成為勞動婦女最大雇主，而這種女性職別集中化(*concentration*)現象便形構了新興且龐大的社會福利產業(*Social welfare industry*, 簡稱SWI)，儘管各國集中化程度有別，但不可置否，這是戰後女性擴大勞動參與、職位流動重要途徑，但很明顯女性位居上述福利機構決策層級代

表性不足，分析其間權力分配，仍可見兩性權力是呈現不平等分配關係(Pearson, 1991)。

福利國家首當其衝為女性主義者所詬病便是它造成了「性別區隔」結果，最具體表現便是貧窮率的性別差異，其實福利國家建制至今已默認完全消除貧窮是不可得，加以社經情勢變遷，貧窮型態已不同凱因斯福利國家草創之初的情境，尤其近二十年來貧窮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現象，總貧窮人口中，居住於女性戶長家戶中的人口所佔比率有逐漸增加趨勢(Pearse, 1978; Zoft, 1989; Stallard, Ehrenreich and Sklar, 1983; Wilson, 1987)，在跨國比較上，美國因較多女性單親數量貧窮人口而有較嚴重貧窮女性化問題，另加拿大、澳洲亦不遑多讓，至於在歐陸、德國則有較高單親母親貧窮率，總結該現象其實彰顯如下問題嚴重性：1.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落入貧窮，尤其是老年單身婦女；2. 一旦婦女落入貧窮，她將比男性更不容易擺脫貧窮；3. 它也引發生長在貧窮女性家戶中兒童的發展問題；4. 若檢視各國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可發現仍有

表一 女性主義福利取向之診斷

(A)分析面向				
	女性被壓迫因素	生物決定論在分析性別不平等上的重要性	如何界定公、私領域間的關係	強調是普遍性或差別性壓迫
保守主義女性主義	國家的介入或干預。	有的說不重要；有的說其重要且決定女性的角色。	維持公、私領域二分劃分方式。	因為個人能力與選擇的不同，所以婦女間彼此是有所差異。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	一些性別歧視的法律。	因為持性別社會化的觀點，不認為生物因素將導致女性不平等，所以從未討論其影響力。	維持公、私領域二分劃分方式，不過強調公領域須做某些改良，但對私領域社會化的議題持保留看法。	較少承認階級或種族間存在不平等情事。
福利女性主義	對母職的貶抑。	女性生理決定了其從事家務的角色。	維持公、私領域二分劃分方式，但強調須必須對私領域做些調整。	強調婦女普遍性被壓迫，但仍強調改善勞動婦女生活。
急進女性主義	父權對性別的壓抑。	生理因素差異決定婦女特殊本質，也決定男性的攻擊與壓迫本質。	以「個人即政治」理念聯結兩領域。	強調婦女普遍性被壓迫。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	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之共謀。	強調婦女生物決定論仍得奠基在社會政治及經濟制度的物質基礎上。	同上，但認為改革生產與再生產關係是關鍵所在。	承認因階級不同會造成相異的壓迫，晚近才承認種族亦是致因之一。
黑人女性主義	種族主義、父權體制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等。	拒絕生物決定論對性別不平等的解釋，強調社會、生物再生產等物質環境才是造成黑人女性特殊經驗的原因。	同上，但強調以種族主義、父權體制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分析所謂生產與再生產間關係。	強調因階級或種族因素造成黑人女性如此特殊的被壓迫經驗。
(B) 演繹於(A)的社會政策規範			(C) 歸納於(A)、(B)的分析方法	
	國家、家庭、婦女間關係	資格要件與福利機構內涵		
保守主義女性主義	一派認為極小化國家介入以利個人主義更進一步的發展，而婦女也可因此依其能力自由進出市場；另一派認為極小化國家介入，是為培養最適母職發揮的境界。	生物決定論與個人主義。	生物決定論與個人主義。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	國家尋求法律改革，執行反歧視法令，促進婦女權益發展。	婦女以個人權利享有國家福利機構所提供的福利。	反生物決定論與意念主義。
福利女性主義	國家體諒「母職」，並注意家庭因不同年齡或性別成員的差異性需求，進而提供適當的福利。	婦女以母親與妻子角色享有國家福利機構所提供福利。	生物決定論與意念主義。
急進女性主義	批判國家只代表父權的利益價值，所以女性必須進行改革，以掌握再生產工具、情慾自主、並創造婦女中心文化。	婦女以個人權利享有福利，強調促成一種在婦女集體控制下、無官僚型式、以女性價值為中心、技術分享的福利提供。	生物決定論與意念主義。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	批判國家只代表父權體制資本主義利益，並增強婦女在家中依賴者、照顧者或市場中低薪勞動者的角色，強調婦女應挑戰此一不利情勢，即促成照顧工作社會化、重組勞動性別與有酬/無酬勞動的分工。	婦女以個人權利享有福利，強調婦女應控制且改變社會福利既有模式，即打破福利階層化組織、提供者與使用者差異、照顧工作性別分工等情事。	物質主義，既非生物決定論，亦非反生物決定論。
黑人女性主義	批判國家只代表父權體制、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等利益，以致黑人女性只擔當如照顧者、僕人、低薪勞動者的角色，因此黑人女性主義者強調應促成照顧工作社會化、重組勞動性別與有酬/無酬勞動的分工、根除有關生產與再生產國際間種族分工的情事。	不論婦女出生國籍、或移民否皆應以個人權利享有福利。黑人女性主義者強調的是一種非種族主義、非性別主義的福利提供模式，如此才可改變現有社會福利中差別待遇、勞動性別與種族分工等問題。	完全物質主義、國際主義，既非生物決定論，亦非反生物決定論。

資料來源:Williams, 1989: pp82-5。

極高比例婦女即便未落入貧窮線下，也是面臨貧窮邊緣的生活。在有關福利國家所得維持(income maintenance)制度消除貧窮的調查發現，實施成效是十分弔詭，如英國平等機會委員會(EOC)一九八七年便發現最低所得組為單一年金領取者，次低組為單親家庭(婦女皆佔上述極大比例)，不過必須注意的是隨著福利國家發展所謂貧窮率問題已被控制在「一合理穩定範圍」。另Quadagno(1988)發現婦女領取老年遺屬殘廢保險(OASDI)的給付水準明顯不如男性，她指出婦女與少數民族未同白人男性在經濟上享有同等的公民權，總之，儘管福利國家已朝向一種性別中立的方式進行改革，即從事一種以個人而非家庭為基礎的賦稅設計與社會安全提供(Sainsbury, 1996)，但施行成效如何仍有待一定時間後評估。

福利國家另一為女性主義者所質疑是其漠視市場外家務勞動(domestic labour)的價值，在「家務勞動論戰」(the domestic labour debate)中，女性主義者便高倡「家務勞動也是勞動(housework is work)」，

但卻成為「無償、無給(free, unpaid)勞動」，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便指出資本主義市場從婦女無償的家務勞動中，剝削她們的剩餘價值(劉靜貞、洪金珠譯，一九九〇)，由於家務勞動並不完全對等市場勞動，因此家務勞動的計算、給付的比例，都與市場勞動不同，加上長久來以所謂「愛的共同體」意識型態強調家務勞動是師出愛、義務、責任之名，重申除女性外別無他人可以承擔，所以就規避了「政府」、「雇主」、「男性勞動者」該負的責任，這也帶給福利國家中高比例職業婦女必須面臨如何兼顧家庭與工作的問題(王順民，一九九四)。在婦女所從事的無償家務勞動又以照顧工作最耗心神，此項照顧生病者、殘障者、老年、兒童等依賴者工作往往意味是一全時性(full-time)工作，福利國家多是繼承家庭主義意識型態，將照顧工作視為母職理所當然，女性自然而然成為提供照顧勞動的最適人選，不過在此有意義討論是福利國家面臨上述狀況，是否建構具保護母性、減輕國民因養育、保育、療育、教育、住宅等生活負擔因素的

發展性制度(盧政春，一九九七)，此可以福利國家家庭政策施行規模進行初探，跨國比較後可發現各國側重程度有極大差異，瑞典、挪威、法國等便具有明確、綜合的家庭政策，美國家庭政策就不十分明確，所以該國女性因照顧家中依賴者離職時其原有福利權益保障不比男性，另與其情境關聯的家庭給付水準亦有保障不足情形(Gordon, 1988)，假若又以臨近日本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為例，可發現婦女所能獲得國家的福利支持可說極為有限(吳明儒、賴兩陽譯，一九九七)。另照顧工作也會影響女性參與市場的勞動數量與品質，就勞動數量而言，儘管戰後女性勞動參與率節節上昇，但當婦女有依賴兒童時，即便如瑞典提供有完善的日間托育服務，她們參與全時工作比例還是明顯下降，如此便會造成所得損失，再加上育兒工作本來就需要花費大量成本，這更容易讓婦女陷入經濟依賴境地，她可能因此更依賴男性配偶所得，否則便得依賴國家所提供給付，不可忽視的是已有研究指出單親家庭的福利依賴可能造成所謂貧窮陷阱困局。就勞動品質

而言，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ECD）也觀察到一種新的勞動型態出現，即所謂部分工時制趨勢，已有大量女性是從事部分工時工作（part-time work），而女性也佔部分工時工作人口的絕大部分，這主要是婦女想平衡家務與工作才不得不出此下策（Pierson, 1991），但在此須指出部分工時工作對婦女福利權益將造成莫大衝擊，尤其在職業年金方案上，部分工時的勞動婦女往往因工作投保薪資，年資明顯不足，必然獲得較差保險記錄（inferior insurance record），結果年金給付金額將不足基本生活所需，其實由雙元福利體系（dual welfare system）國家實踐經驗已發現福利國家給付體系呈現性別區隔化現象，男性永遠是社會保險體系受益者，女性卻因上述因素只能成為社會救助體系受益者，所以女性在福利國家福利給付體系下依舊處於不利的位置（Orloff, 1993），除上提及外，部分工時工作不管在薪酬、職工福利、升遷或訓練上皆屬條件惡劣。

福利國家最後為女性主義者所質疑是在勞動政策上，將女性視為可調節勞動市場

供需失衡之廉價勞動力，往往如此使其淪為雇主節省生產成本血肉，但女性主義者已發現不能再以「產業預備軍」一言以蔽之婦女勞動動態，因為婦女實際上並不能完全取代男性的工作，而職場上仍維持著僵化的性別區隔情事，福利國家下婦女就業職業別只集中在以社會福利產業為主，如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的女性有相當比例是受雇政府福利服務部門，部分女性主義者便推崇此為女性與福利國家合夥關係典範，婦女為國家的受雇者，也是以稅金支持福利國家的納稅者，更重要是作為生育者與主要老年人口的婦女是福利最重要的受益者（劉毓秀，一九九七），但另有女性主義者不苟同此等論述，她們認為不管在英國國民保健服務（NHS）、德國專責幼教機構或美國醫療機構護理部門，這些女性只是節省營運成本才晉用廉價勞工罷了，儘管女性勞動參與率可因社會福利產業擴充而提昇，但這些女性所從事工作還是多為部分工時的工作，所以上已提及部分工時工作對女性不利情事仍將一一出現。

總結上述福利國家運作機制所產生性別

不平等結果，已使女性主義者質疑福利國家實現公民權理念未果之問題，因為福利國家只是藉著公民權口號宣揚，佯裝已達兩性實際平等的目標，一旦實證公民權概念於所經驗社會脈絡中便極易發現兩性仍存在差異性公民地位，而Marshall統一公民權概念也無法對此提出合理解釋，因為他所提「社會權」（social citizenship）不過是賦予有酬勞動者的邏輯概念，尤其堪稱福利國家巨擘——社會安全建制更是回應此等工作場域邏輯，完全以男性為主的工資工人及其家庭觀點從事之制度設計（傅立葉，一九九八），女性受限傳統性別分工，是無法充分從事市場勞動乃至獲取有利職業年金給付，即便分身有術，許多女性也僅從事部分工時工作，另Lister（1990）亦指出社會賦予女性照顧者（carers）、無償勞動（unpaid work）工作限制了婦女實踐政治權可能性，如此益發促成她們在經濟上依賴地位，所以女性家務、照顧工作是導致其無法實踐完整公民權（full citizenship）主因，倘若欲確實保障女性公民權，實有必要重構現有公／私領域分工模式，此將涉及

國家、社會對女性家務角色見解，除非它們誠懇表達對家務工作善意態度，國家認可「婦女」工作價值、協助婦女擺脫家務負累、改善婦女勞動條件，才有助女性角色釐清、女性完整公民權實踐、女性充分就業與女性生活情境改善，以斯堪地那維亞國家對女性公民權實質保障策略為例，國家便尊重、保護女性選擇工作者(worker)與母親(mother)角色自由及伴隨之福利，所以女性皆可自由選擇所想扮演角色並獲得充分生活保障(Woodward, 1997)。不過由對戰後福利國家正當性共識消逝(the lost legitimacy)趨勢看來，不管是制度性或殘補式福利國家皆深思國家是否有必要再承擔最主要福利提供者角色，尤其英語系國家在新右派政治勢力崛起後，已放棄擴張福利方案規模甚至主張縮減之，至於歐陸工業國家近來也有鬆動其所堅守福利底線情形，上述趨勢無不透露國家將漸減其介入所有福利事務可能性，相對個人或家戶有責任為其自身福祉做出良好規劃、儲備，其實家庭、市場、國家本是思考福利提供基調，國家福利提供愈趨保守之際，

實是賦予家庭、市場扮演更強福利提供角色機會，在此須關注的是，國家弱化其福利色彩的過渡階段中，是否已存在與婦女相關且具建設性家庭政策，以幫助家庭與市場做出正向聯結？假若是屬消極性政策設計便只存在強化階層化結果，中上階層家庭原本就容易與市場做良好資源整合，但低下階層，尤其是弱勢女性單親卻因與市場媒合程度低，結果只有依賴愈來愈嚴苛資格限制之福利給付，成為社會棄守的一群，在面對下世紀初福利國家改革愈益強調工作—福利聯結原則下，福利國家如何整合統籌社會政策與勞動政策將深遠地衝擊婦女福祉，此也將成為女性主義者亟待著力、行動的重要福利議題。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研究生)

參考文獻：

- 王順民 福利國家理論導讀：「政治經濟學」與「福利國家」 社區發展季刊 七十一期 一九九四
- 王順民 女性主義觀點對台灣社會「婦女問題意識」的論述意義 社會工作學刊 三期 一九九四

王瑞香 檢視美國激進女性主義 女性人

三期 一九九〇

李淑容 國家與家庭的關係—兼論我國應有的家庭政策 社區發展季刊 七十一期

一九九四

李明政 意識型態與社會政策模型 台北

冠志出版社 一九九四

吳明儒、賴兩陽譯 資本主義福利體系 日

本、英國與瑞典之比較 台北 巨流

圖書公司 一九九七

張世雄 社會福利的理念與社會安全制度

台北 唐山出版社 一九九六

張齡友 父權體制下女性單親家庭致貧因素

之探討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

論文 一九九四

傅立葉 女性與年金權 婦女與經濟安全研

討會 台北 台大社會系 一九九八

劉靜貞、洪金珠譯 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

「馬克思主義之女性主義」 台北 時報

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一九九七

劉毓秀主編 女性、國家、照顧工作 台北

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一九九七

盧政春 德國子女津貼制度之研究 東吳社

會學報 五期 一九九七

顧燕翎主編 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 台北

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一九九六

York: Routledge.

Sweden,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Mishra,R.(1979) Society and Social Policy:

22: 69-98; (1996) Gender, Equality

Dale, J. and Foster, P. (1986) Feminists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welfare,

and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and State Welfare, Boston: Routledge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gan Pau.

The Welfare State in Crisis. St.

Shaver, S. and Bradshaw, J. (1995) The

Gordon, M. S. (1988) Social Security

Martin's Press.

Recongnition of Wifely Labor By

Policies in Industrial Countries:

Miller, D. C. (1989) Women and Social

Welfare States. Social Policy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Cambridge

Welfare--A Feminist Analysis, New

Administration, Vol(29).

University Press.

York: Praeger.

Taylor, D.(eds.)(1996) Critical social

Johnson, N. (1987) The Welfare State in

Murray, C. A.(1984) Losing ground: American

policy: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Transition. Brighton, Wheatsheaf.

social policy, 1950-1980. New York:

relations, London : Sage.

Kamerman, S. B.(1995). Families: Theoretical

Basic Books.

Williams, F. (1989) Social Policy: A

and Policy Issues. Encyclopedia of

Orloff, A. S. (1996) Gender and Welfare

Critical Introduction--Issues of

Social Work, Washington, D. C.: NASW,

State.Estdio/Working Paper.

Race, Gender and Class. Cambridge,

19th edition.

Pascall, G. (1997) Social Policy: A New

UK: Polity Press; Oxford, UK; New York,

King, S. D. and Ward, H.(1992). Working

Feminist Analysis, London; New York:

NY, USA: Blackwell.

for Benefits: Rational Choice and

Routledge.

Yuval-Davis, N. and Anthias, F.(eds.)

the Rise Work-Welfare Programmes.

Pierson, C. (1991) Beyond the Welfare State?

(1989) Woman, nation, state, London:

Political Studies. XL.479-495.

,UK: Polity Press; Oxford, UK; New

The MacMillan Press .

Lavalette,M. And Pratt,A.(eds.)(1997) Social

York, NY, USA: Blackwell.

Policy: A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Sainsbury, D. (1993) Dual Welfare and Sex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Segregation of Access to Social

Maclean, M. and Groves, D. (eds.)(1991)

Benefits: Income Maintenance Policies

Women's Issues in Social Policy. New

in UK, the US, The Netherlands and